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開始，中國再次掀起了以市場經濟為標誌的現代化改革浪潮，社會出現了巨大的變化。當下要對這場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社會改革進行全面評價，似乎還為時過早。不過，其中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使當代精英文學迅速走向社會邊緣，而且隨着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知識分子敘事出現了新質生產力。一方面是以何頓、丘華棟、韓東等為代表的底層知識分子書寫，生動表現出市場經濟的興起與底層知識分子的窘迫和躁動；另一方面是從賈平凹到閻真的體制知識分子書寫，深刻表現出作為成功人士知識分子的無奈與掙扎。新世紀的格非和許春樵等，則在描述底層知識分子艱難人生的同時，思考知識分子道義和最後良知。

與此同時，女性文學異軍突起，以陳染、林白等為代表的 60 後女性主義作家將敘事目光轉向女性自身，而且將筆觸深入個體的內在世界，似乎沉溺於私人敘事，獨自聆聽來自生命深處的訴求。以衛慧和棉棉為代表的 70 後女性主義作家則告別激進的抗爭，掉頭轉向從世俗生活世界，在我行我素的自由選擇中喃喃自語。不過，新世紀以潘向黎等為代表的女性作家，開始從“我”與他者的關係上審視自我，還原出生活世界中知識女性的豐富自我。這些個性迥異的女性話語中最大公約數，就是集體地疏離宏大敘事，掙脫關於知識分子身份認同的集體幻象的束縛，具有比較明顯的斷裂特質。

惶惑人生中的知識分子

一、慾望人生中的成功人士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伴隨着市場經濟的轉型明顯加速，其中一個顯著的跡象就是現代都市迅速膨脹。新世紀中國的現代都市像磁鐵一樣吸引着來自四面八方的各行精英，因而新世紀知識分子的形象譜系，基本鑲嵌在現代都市的背景上。

現代都市知識分子的浮出海面，讓九十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形象與八十年代的大相徑庭。八十年代尚是個充滿樂觀主義的新啟蒙時代，城市作為進步社會的文明象徵，寄託着國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願景。當時人們還不曾意識到，啟蒙現代性所強調的科學理性和技術力量，實質上是人類控制自然、獲取財富的有力手段。也就是說，人類促進城市繁榮的內在隱秘動力，原本就混雜着人類貪慾的本性，而且這種貪慾一旦逸出所羅門的魔瓶，便輕易地沖決傳統文化多年來苦心經營的道德精神堤壩，就連一向被視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也難以自持。現代知識分子面對洶湧的經濟大潮，顯然來不及做出應有的理性心理反應，因而顯得惶惑不安。

當然，真正具有當代文學史斷代特質的知識分子形象，還是九十年代從賈平凹的《廢都》裏反映出來的。這部長篇小說以歷史文化悠久的古都西安為當代社會的背景，記敘“閒散文人”作家莊之蝶、書法家龔靖元、畫家汪希眠以及藝術家阮知非“四大名人”的現實人生，以濃縮的方式表現出西京

城市形形色色的“廢都”生活景觀。小說以莊之蝶與幾位女性的情感糾葛為情節主綫，穿插敘述他與阮知非等諸位文化名士的交往，筆墨濃淡相宜。在諸多女性中，唐宛兒、柳月和牛月清為小說着墨最多也最為主人公傾心的鮮明人物。在這些充滿靈性、情感豐富而且具有古典悲劇色彩的人物身上，體現出作者獨特的審美理想。這部長篇小說於1993年問世，因為它的性愛描寫與民間歌謠大膽到驚世駭俗的程度，還有以方格子替代被刪除文字的文化效應，均給當代文壇和當代社會製造了一個驚奇。這時社會彷彿發覺，這個以“文化尋根”作品蜚聲文壇的純文學作家，原本也是一個吸食人間煙火的俗人。

起初，“《廢都》熱”體現在商業性炒作上，其露骨的性描寫與政治性的民間歌謠雖然遭受主流話語的嚴肅抨擊，卻投合大眾文化市場的需求，一時竟有洛陽紙貴之勢。批評界也做出強烈反應，一時評論如潮，褒貶不一。但是，當時的評論大多受制於慣性的道德思維方式，迄今為止我們還是低估了這部小說的文學史意義。李建軍認為，《廢都》的出現，“標誌着知識與權力的臨時同盟的終結，標誌着在寫作領域娛樂道德觀開始取代行善道德觀，標誌着利己的私有形態寫作開始取代利社會化寫作，標誌着理性、道德、責任和良知的全面崩潰，標誌着服從市場指令的寫作傾向和出版風氣的形成”。¹雖然我不太同意李建軍對《廢都》的嚴苛批評，因為他對這部小說的文學史意義的認定不夠準確，但是作為道德維度的文化批評，他的觀點在當時還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關於《廢都》的爭鳴主要來自對文本理解的歧義上。這部小說深入當代生活的一個不可迴避的切入口是性愛，而就在這個敘事的切入口上，我們可以聽到兩種批判的聲音：一種批判是晚生代批評家對莊之蝶迷戀女性的呵斥。晚生代批評從《廢都》中看到庸俗的鴛鴦蝴蝶派的主題與敘事圈套，及

1 李建軍：〈私有形態的反文化寫作——評《廢都》〉，載李斌、程桂婷編著：《賈平凹創作問題批判》，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頁。

其隱含的商業文化的消費性。當然，還有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莊之蝶玩弄女性之中發現的賈平凹的男性文化情結。另一種批判則是針對莊之蝶同代人對《廢都》的感傷撫摸式的默許。恰如曠辛年所說，在莊之蝶同代人的撫摸性閱讀中，“深刻體味到性愛死結後面強烈的挫折感、失敗感、末世感和沒落感，一種綿綿無盡的哀傷慘痛，在淋漓盡致的爛熟的肉慾鋪陳後面隱含的精神頹敗的命運感”。¹

《廢都》創作上的缺陷和思想文化上的困惑是顯而易見的。所謂創作上的缺陷，是指小說把作為西京四大文化名人的代表人物莊之蝶的壓抑和放縱的心理卑瑣史，放置在文化潰敗的現實情境中進行誇張地表現。這表明賈平凹明確感受和體驗到，曾經以文化英雄自命的一代知識分子，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難以承受刻苦銘心的人生失重與生命空虛。然而，賈平凹在展示莊之蝶們的文化心態時，無法將這種形而上的存在思考有機地融入藝術世界。他知道，文化知識分子性愛觀念的變化是個表現的焦點，但在如何表現上面卻出現問題。他如此沉溺在現代版本《金瓶梅》的刻意模仿之中，根本沒有達到戲仿的高度，以致人們感覺到他有種把玩和放縱的輕浮。因此讀者有理由把《廢都》看成是一部庸俗的多角戀愛小說，事實上它在大眾文化市場的暢銷，也指證了這一點。

當然，創作上的缺陷與他思想上的困惑是分不開的。賈平凹敏感地體驗到世道變化，這是沒有錯的，但如何從理性上思考這種斷代性的變化確實是存在問題的，他並沒有從思想哲學的高度充分理解莊之蝶這樣的文化知識分子的人生變化及其精神失態。米蘭·昆德拉說過：“我有這種感覺，一個肉體之愛的場景產生出一道強光，它突然揭示人物的本質並概括他們的生活境況……情慾場景是一個焦點，其中凝聚着故事所有的主題，置下它最深奧的秘密。”²我們可以說，賈平凹抓住了這個時代的情慾焦點，卻沒有洞悉其

1 曠辛年：〈從《廢都》到《白夜》〉，《小說評論》1996年第1期。

2 艾曉明編譯：《小說的智慧：認識米蘭·昆德拉》，吉林：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頁。

中“最深奧的秘密”，更沒有從社會歷史的維度去審視這個深奧的秘密。

其實，莊之蝶既企圖在久受禁錮的慾望中放縱逃遁，又想在其中進行自我確證。他不斷地追求女性，以致女性反而成了次要對象，而追求慾望的過程似乎成為他生命的重要行為，因而饕餮秀色的性愛追求，便成為他無意義存在的全部生命意義。其實，在經歷了和多個女人的歡愛之後，莊之蝶並沒有太多的人生快樂與內心滿足，生活對他來講依舊沉重如初，絲毫不見輕鬆半點。繁複多樣的性生活沒有充實他百無聊賴的人生，反而是愈來愈走向空寂，最終也是無家可歸。這就是說，莊之蝶的情慾放縱，包含了深刻的知識分子生存形態的變異和個體人生的存在問題，但是，賈平凹並沒有從知識分子存在的思路上去探索這種放縱的情慾，而是從反城市文化、反現代文明和反理性的角度去理解莊之蝶的沉淪。小說中那頭會思考的奶牛，就是隱含作者的立言：“我寧願在山地裏餓死，或者寧願讓可怕的牛虻叮死，我不願再在這裏，這城市不是牛能呆的！”這種鄉村保守主義的聲音，我們並不陌生，從廢名、沈從文、汪曾祺到賈平凹，對宗法田園生活的詩意美化和對現代都市的本能厭惡，是一條現代化過程中的保守主義文化傳統貫穿始終。可是，用這種鄉村情結和都市批判來拯救在歷史轉型時期，文化失敗的知識分子莊之蝶們，恐怕只是表達思想文化困惑的一種方式，並不能解決這種歷史情境中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問題。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看到，《廢都》畢竟是為特定的歷史轉型社會塑造了一個精神頹敗的文化標本，留下一種意味深長的歷史警醒。在《廢都》的藝術世界，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迷狂年代知識分子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失範，他們輕易拆除了個體靈魂中人格精神的防綫，在精神惶惑中放縱個體各種慾望，毫無羞恥地加入生命狂歡的行列，以身體愉悅來掩飾自身的精神惶惑。特別值得注意是，莊之蝶是歷史轉型時期最初的都市知識分子的頹敗形象，因而他的自我放縱及其生命虛無具有當代文學史意義。

閻真的《滄浪之水》（2001年）可謂新世紀知識分子書寫的開篇之作，它敘述了一個技術知識分子的官場沉浮，表現在圍繞着權力和金錢軸心運轉

的世界中一個知識分子從堅守道義到精神惶惑和逐漸墮落的過程。主人公池大為的父親，當年因仗義執言地替同事講了幾句公道話被劃為“右派”，還被趕出了縣中醫院，帶着家人來到一個小山村，當了一個鄉村醫生。20年後他看到兒子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吼了一聲“蒼天有眼”就一頭栽在地上。1985年池大為研究生畢業，回到省衛生廳辦公室工作。最初他也是一個鄙視社會腐敗的知識分子，為此屢屢吃虧。衛生廳裏要整頓省內的中藥市場，派池大為去衛生廳廳長的家鄉吳山地區調查，那裏假藥氾濫，他調查回來後不顧老同事的勸阻，還是向藥政處彙報了真實情況。在一次支部民主生活會上，他還批評廳裏花30萬買一部進口轎車。於是，他被調離省衛生廳辦公室，被打發到清閒的中醫學會工作，成為一個現代隱士。他為自己的人生理想付出了沉重的生活代價，女朋友也斷然與他分手。

池大為心懷在社會實現自我價值的人生慾求，卻被閒置在中醫學會，一待就是四五年。個體的清貧人生還可以承受，可是家庭也跟着受累就難以接受了。他妻子的單位離家較遠，早出晚歸，可就是調動不了；兒子三歲該上幼兒園了，本想進省政府幼兒園，可他想盡了辦法進不去。這時，他的同事晏之鶴的話開始進入他心中：

你剛從學校畢業，血性未涼，書生意氣，反過來說教條主義嚴重，守着幾條原則以為那是真的。殊不知人間真實從來不從原則出發，利害才是真的，原則只是一種裝飾，一種說法。這樣都幾千幾萬年了，不會因誰而改變。¹

機會總是存在的。在一次單位的權力鬥爭中，他聽從晏之鶴的勸告，投靠了馬廳長。於是他晉升了副高職稱，通過了博士考試，調到醫政處當副處長，房子也換成套間了，妻子的工作也調動了，甚至破格晉升為主治醫生。

1 閻真：《滄浪之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頁。

人生變化教訓了他，他開始告別人生理想，學會同流合污。後來由馬廳長推薦，他被任命為副廳長、廳長，從此行走在灰色地帶，腰纏萬貫。小說的結尾，寫他給父親上墳，他燒掉了父親遺留給他的《中國歷代文化名人素描》，並與死去的父親對話：

你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時間的公正，把信念和原則置於生命之上。你對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沒有現實的庸人氣息。我理解你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姿態，那樣從容不迫地走了犧牲的道路，甚至不去細想這種犧牲的意義……而我，你的兒子，卻在大勢所趨別無選擇的口實之中，隨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條道路，那裏有鮮花，有掌聲，有虛擬的尊嚴和真實的利益。於是我失去了信念，放棄了堅守，成為一個被迫的虛無主義者。我的心中也有隱痛，用灑脫掩飾起來的隱痛，無法與別人交流的隱痛，這是一個時代的苦悶。請原諒我沒有力量拒絕，兒子是俗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獄的決心去追求那些被時間規定了不可能的東西。¹

這裏，我拘文牽俗地大量引用了池大為的內心獨白，是因為這個形象是個技術知識分子，有着豐富的內心活動，因而小說中的他總是在為一己的利益追求自我辯解，為個人的獲取提供行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從表層上說，他是在嚴酷的生活逼迫與炫目的權力誘惑下逐步喪失自我的，他的內心獨白是一個清高的純粹學者蛻變為成功的官員學者，提供一種世俗化的所謂合理的邏輯。但是從深層說，它實質上表明，在一個外在環境混濁不清和虛無主義盛行的年代，內心惶惑的知識分子最終難以自持，很容易蛻變為權力和金錢的崇拜者。因此他的所有內心獨白，都是對自己的妥協和同流合污進行自我辯解，也是自我道德人格堤壩的潰決。

1 同上，第 522 頁。

值得深思的是，社會權力的詭異之處在於它的隱形特質，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明確感覺到它的無處不在，而且法力無邊，但在陽光之下似乎又無跡可尋。這倒不是說權力不可認知與言說，而是說它自有一種潛規則，不宜放在陽光下來認知和言說。因此小說沒有將敘述視角投射在外在環境上，而是置於池大為的內心世界，深入剖析一個純潔靈魂逐漸墮落的內在緣由：殘酷的現實生活逼迫他向權力退讓妥協，而一旦享受到權力的益處，便像上癮一樣企圖攫取更大的權力；而且越是泯滅自我，越是擁有更大的權力。

這部小說還揭示出“叢林法則”從市場領域延伸到知識領域，乃至漫延全社會的“自然合理”的邏輯。不過，小說盡量簡化人物的複雜個性，把人物性格和命運限定在行為主義和環境決定論的範圍，一些像池大為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了擺脫清貧壓抑的人生困境，維繫個人與社會的有機聯繫，不得不屈服於世俗的市場和體制。創作主體有意渲染世俗功利的支配力，擱置可能的生活意義和價值向度，因而知識分子在生存重壓和社會失序下，不僅棄置終極關懷，而且從根本上喪失了理性意識和道德反思能力。

從《廢都》和《滄浪之水》中我們可以發現，九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的成功人士形象的深層惶惑，在於他們並不認為世俗社會頂禮膜拜的金錢、權力和美女具有終極性的價值意義，但卻分明感覺到它們在現實世界擁有宰制社會及其人際關係，甚至操縱人的一切行為動機的巨大魔力。在銅牆鐵壁一般的世俗社會面前，這些成功人士面對種種功利人生的誘惑深感個人的無力和無奈，只能在濁世紅塵中隨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因此我認為，這是一種人格分裂式的惶惑：突如其來的市場經濟喚醒了他們的個體生命意識，他們開始認同世俗社會的功利人生，並對以往的相對貧困和體制束縛感到難以忍受；可是為了滿足世俗人生的生命慾望和利益需求，又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正義信念，因為轉型時期的現代社會畢竟沒有建構起法制化的有序市場與公平化的競爭機制。於是，他們面對變動的現實採取了相應的自我調整方式，對於失序的社會給予不認同的無奈接受；面對明知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為了一己利益也給予不認同的忍受。

二、慾望人生中的底層知識分子

現代社會的功利主義特質，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社會市場經濟轉型之初便暴露無遺。最初揭示現代功利主義內在貪慾動力與巨大引誘的，是那些表現在金錢與權力漩渦中浮沉的底層知識分子人物形象。所謂底層知識分子，是指這些人物並不像上面論及的莊之蝶、池大為等文化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是社會階層中的普通人物，如中小學的一般教師、大學畢業不久的普通公務員等。何頓、丘華棟等人九十年代的作品，多表現這類底層知識分子，並且憑據較為粗礪的寫實文風震驚文壇。他們的作品多以逼近社會本相的寫實方式，真實呈現市場經濟原始積累時期的粗鄙現實，揭示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對於底層知識分子內心產生的炫目誘惑。

何頓，湖南作家，1977年插隊務農，1983年在湖南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在中學擔任過美術教師，還從事過裝修工作，現為長沙市文聯創作室專業作家。他在《收穫》1993年第1期上發表中篇小說《生活無罪》後，引起批評界的關注，以後他接連發表中篇小說《我不想事》《弟弟你好》《無所謂》《太陽很好》等，以及長篇小說《就這麼回事》《我們像葵花》《荒原上的陽光》《喜馬拉雅山》等。他立足湖南本土，以在場的姿態貼近現實人生與人性本相，以粗礪的寫實敘事展現堅硬的社會現實；汲取地域性語言進行個性化敘事，提升生活經驗的美感，從而由地域抵達整體，被評論界視為“新生代”和“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之一。應該說，他的小說是市場轉型時期都市生活的一面精彩的人生鏡子，真實而生動地映現出商業社會的慾望人生，也典型表現出九十年代底層知識分子的人生迷失。

中篇小說《告別自己》描述的是長沙郊區H中學教師群體的生活狀態，是九十年代底層知識分子的真實人生寫照。小說從主人公雷鐵帶領大家吃碩鼠開始。這隻碩鼠顯然具有象徵意義，因為它們嚴重侵擾教師們的日常生活，攪得學校不得安寧。接着，便寫雷鐵和妻子歐陽懿的困頓人生：一方面是清貧的生活。雷鐵和歐陽懿是人到中年的中學教師，但是他們窮得連一台

彩色電視機都買不起。雷鐵希望通過畫連環畫的兼職來補貼生活，但他畫了一年的作品卻無法出版。另一方面則是毫無尊嚴的職業人生。雷鐵到了評職稱的年限，但因為他不會巴結領導，又在輔科任教，始終不能晉升中教一級，就連他的妻子都瞧不起他。他們夫婦都無法在自己的教師崗位上獲得職業尊嚴與精神滿足。因此，他們的現實人生中承受着經濟和精神的雙重壓力，青年時期的浪漫和理想被貧困而封閉的現實徹底摧毀，生活在一種無望的焦慮狀態。最後歐陽懿經不起舊日老友的誘惑，打胎後獨自去深圳學校任教。雷鐵也別無選擇地“告別自己”，結束這種窩囊的人生現狀。他辭職南下，去廣州畫行從事商業創作，“他大步邁到大街上時，他覺得他一頭扎進滔天惡浪的茫茫大海”。¹

九十年代大量底層知識分子離開體制社會，在市場社會上重新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雷鐵就是其中的一個。從雷鐵的離開過程可以發現，他們的出走固然是自願的，因為他們生活在毫無尊嚴的清貧人生之中，並被一種僵硬的體制緊緊束縛，而且在清貧和束縛中看不到任何理想人生的希望。但是，他們並沒有從這種自願的決絕中獲得如釋重負的感覺，而是帶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茫然的遠方，因為那是他們並不熟悉的天地。

中篇小說《無所謂》則以悲劇性的敘事方式，講述經濟轉型時代一個底層知識分子不斷掙扎又不斷失敗，最後死於非命的悲哀人生。主人公李建國在大學時代就熱衷鑽研尼采等西方哲學家的著作，並顯現出特有的寬廣胸懷和博學多才，是個視野開闊、為人謙和、品學兼優的學生幹部，獲得所有同學的由衷敬佩。然而，他也是一個生不逢時的悲劇人物，因為他身置一個根本不屬於他的社會急劇轉型時代，金錢和權力才是這個時代的主宰，為此他不斷退卻，調整自己以適應這個時代，一直退到無處可退的境地。

首先是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一所邊遠地區的大學從事音樂教育工作，他很樂意地接受了這個分配，想“利用大學的時間，做些自己的思

1 何頓：《太陽很好》，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34 頁。